“梁陈方案”原点考论
——以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Liang-Chen Plan: Centered on the Symposium on Urban Planning in Beiping on May 8, 1949

李浩 | LI Hao

摘要：以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讨论了1949—1950年间梁思成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区建设规划思想的渊源及流变。1949年5月8日座谈会是“梁陈方案”规划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点，从这次座谈会到1950年2月“梁陈方案”的正式提出，梁思成一直坚持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主张，但其规划思想和意图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识到，“梁陈方案”并非一份单纯的技术性文件，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多重意蕴。

关键词：城市规划史、北京、首都行政区、梁思成、陈占祥、苏联专家

Abstract: Centered on the Symposium on urban planning in Beiping on May 8, 1949,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ANG Ssu-cheng's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Beijing capit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rom 1949 to 1950. The Symposium on May 8, 1949 i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the planning thought of the Liang-Chen Plan. From this symposium to the formal proposal of the Liang-Chen Plan in February 1950, LIANG Ssu-cheng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lanning idea of building the capit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the western suburbs, but his planning thought and intention have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Review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e can realize that the Liang-Chen Plan is not a simple technical document, but has quite complex multiple implications.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Beijing, Capit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IANG Ssu-cheng (LIANG Sicheng), Charles CHEN (CHEN Zhanxiang), Soviet experts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提出或学术成果的诞生，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乃至特殊的历史因缘。对有关学者学术思想或成果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应当关注于其学术思想和成果所具有的科学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还应当对作者的研究工作进展、学术创作动机和当时所处的学术环境等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唯有如此才能进入真实的历史境域。城市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同样如此。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以《梁陈建议》代称），主张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专门的首都行政区（所提规划方案被称为“梁陈方案”），这一规划设想对于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显然是十分有利的，但实际上却并未能获得政府方面的完全采纳。长期以来，关于“梁陈方案”的话题已经在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直到今天为止，仍是一个存在巨大分歧的争议问题，尚待学术研究作更深一步的探索。众所周知，1949年援华的苏联专家曾经建议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规划建设首都行政机关，这是与“梁陈方案”截然不同的一个规划思路。由此，大量研究和讨论中将“梁陈方案”归结为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建议相抗衡的产物[1]。那么，真实的历史情境是否如此？“梁陈方案”的规划思路是否是在苏联专家到达北京以后才被提出的？

作者：
李浩，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178028）；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UDC2021010121）

Doi：10.12285/jzs.20220808002

梁思成和陈占祥实际的规划动机和隐含的思想意图又何在？从城市规划史研究的视角分析，这些疑问与 1949 年 5 月 8 日的一次都市计划座谈会（以下简称“5.8 座谈会”）有着重要的关联，关于“梁陈方案”的既有研究对这次座谈会已经有所提及[2]，但尚未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本文就此作一专门探讨，期望对“梁陈方案”事件的进一步认识有所贡献。

一、“5.8 座谈会”概况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1949 年 9 月改称“北京”）和平解放，毛泽东于 3 月 5 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了“定都北平”的意向[3]，中共中央驻地于 3 月底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西郊的香山一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市政府，对原北平市政府工务局进行改组后于 4 月 1 日成立了北平市建设局，这就是新中国首都建设最早的规划主管部门，曹言行和赵鹏飞分别任局长和副局长[4]。

从北平市建设局筹建伊始，首都规划便是其一项重要工作。1949 年 3 月，针对《人民日报》社要求在东单广场的空地盖报社办公用房等事宜，曹言行邀请专家学者座谈并征求意见，到会的有前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华南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北平著名建筑师钟森，以及筹建中的北平市建设局的一些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经讨论，参会者一致认为东单广场应辟为公园绿地而不能随便占用。“当时迫切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即将成立，需要大批用房，现有空地不能随便乱用，这便需要研究，需要规划”[5]。根据参加本次座谈会的张汝良（时为筹建中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回忆，“会上曹言行局长提出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即（日后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问题，梁思成就提出应在西郊与中共中央在一起”[6]。这是最早有关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在西郊建设动议的记录。

在北平市建设局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简称“中直修建办事处”）也获成立。其主要责任是为中央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和筹建新的办公楼，其中一项重要设计任务是为中央首长在西郊万寿路附近修建“新六所”[7]工程。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北平的都市规划曾有建都北平、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公主坟以西为新市区”[8]。为了建设新市区，中直修建办事处特别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开始时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9]。

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建办事处正式成立后，北平市建设局于 1949 年 5 月 8 日组织召开了一次正式的都市计划座谈会，即本文介绍的“5.8 座谈会”。为使会议主题明确，讨论聚焦，交流深入，市建设局事先准备了四个议题：（一）如何把北平变成生产城问题；（二）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三）城门交通问题；（四）城区分区制问题[10]。目前，北京市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四个议题发言情况的完整记录（图 1），为后人深入考察首都规划研究的早期情况提供了可能。

档案表明，“5.8 座谈会”会期为 1 天，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参会者包括特邀专家学者、中央和北平市有关领导以及北平市建设局有关人员等 3 类共 35 人。就专家学者而言，其中有不少为当时的社会名流，如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雕塑专家滑田友、曾主笔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油画像的美术家周令钊、近代曾任伪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局长的市政工程专家林是镇、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和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的工程界专家华南圭，清华大学梁思成、王明之、刘致平和北京大学朱兆雪、钟森、高公润以及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冯法禩等教授，专业领域涵盖艺术设计、建筑学、市政工程、都市计划等多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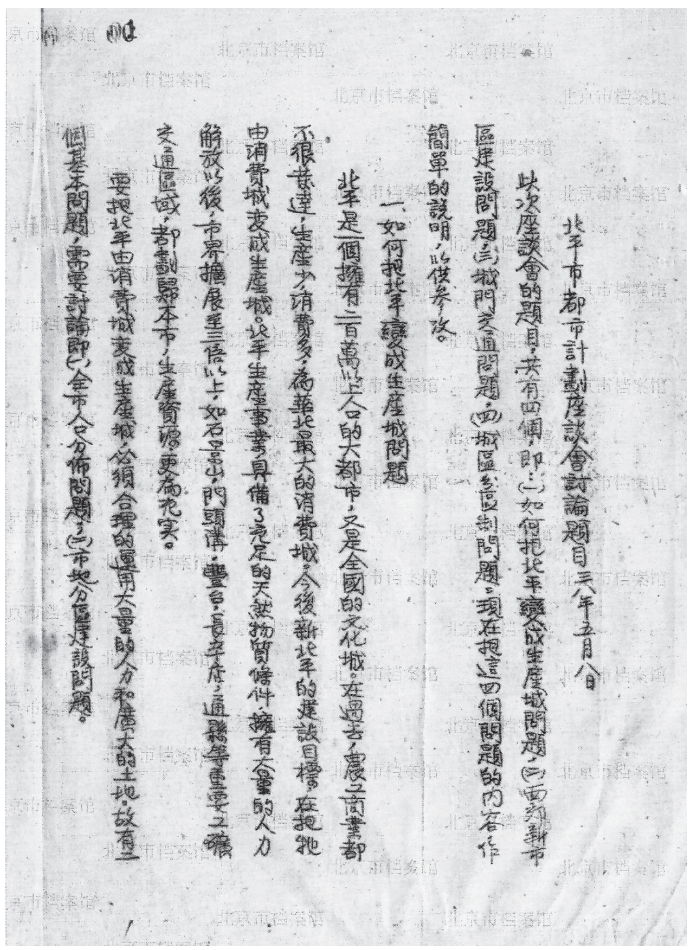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討論題目三、年五月八日
此次座談會的題目共有四個，即：(一)如何把北平變成生產城問題，(二)西郊新市區建設問題，(三)城門交通問題，(四)城區分區制問題。現在把這四個問題的內容作簡單的說明，以供參攷。
一、如何把北平變成生產城問題
北平是一個擁有二百萬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又是全國的文化城。在過去，農產商業都不很發達，生產少，消費多，為華北最大的消費城。今後新北平的建設目標，在把他由消費城變成生產城。北平生產事業具備了足的天然物質條件，擁有大量的人力解放以後，市界擴展至三倍以上，如石景山，門頭溝，豐台，長辛店，通縣等重要工礦交通區域，都劃歸本市，生產資源更為充實。
要把北平由消費城變成生產城，必須合理的運用大量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故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討論，即(一)全市人口分佈問題，(二)市地分區使用問題。

图 1：1949 年 5 月 8 日都市计划座谈会档案（座谈会讨论题目，首页）

二、梁思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规划构想的早期呈现

会议记录表明，在“5.8 座谈会”上，先后有 80 多人次发言，其中最早发言的专家是华南圭和梁思成，两人因参加过 3 月份的座谈会而对会议意图和有关情况较为了解。华南圭重点谈了对北平市发展生产的看法，并结合所携带的两张近代北平规划图，阐述了对北平西郊新市区规划的意见。梁思成紧随其后，针对建设局事先准备的四个议题，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有关看法和意见。据统计，梁思成在这次座谈会上共 18 次发言，谈话记录约 4000 字，是这次座谈会上发言次数和内容都最多的专家（图 2），可称之为 5 月 8 日座谈会真正的“主角”。

从城市规划史研究的角度，最值得关注的当属梁思成在这次座谈会上关于西郊“新北京计划”早期设想的阐述。这些阐述特别体现在他首次发言内容之中（18 次发言中的第一次发言，详见文后附件）。对于北平西郊新市区，梁思成在发言中提出应当“首先讨论性质”“先确定西郊新市区的用途”，并明确主张“将来性质应为行政中心，联合政府所在地”“应定为首都行政区”“以行政区为中心，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11]。可见，关于“首都行政区”规划是梁思成此次座谈会发言所阐述的核心规划设想。

不仅如此，在这次发言中，梁思成还详细阐述了首都行政区规划的具体方法：“应先将行政区划出，住宅区围绕行政区（定所有居民为行政公务员）”“分区的原则应该分为邻里单位（或叫它一区一保也可以），每一个邻里单位自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集团”“本区除维持本区内水电交通所需的修理工业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工厂设立”“每个邻里单位应有充分的小公园，及儿童游戏场，供本单位成人和儿童游憩之用”“每一邻里单位，应有林荫大道隔离”“要将整个区四周用麓田或公园包围”[12] 等。

为了有效支撑首都行政区的运转，梁思成指出“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道路系统”，并强调要避免过境交通的不利影响：“凡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路，如上西山八大处，石景山门头沟的公路或是往来丰台、良乡的公路，均不应穿过本区”。他还主张采用“环形 + 放射”型的道路网结构：“区内的交通网应以行政区为中心，在相当距离建造几条平行的环形道路，以避免由区的一极端到另一极端的车辆穿过市中心。这几条环形马路之间，应该有中心放射出来的次要干路”[13]。“此外，在交通适当场所，应设立中学、图书馆等。当视整个计划而定”[14]。

对于上述规划设想的优点，梁思成总结为四个方面：可以使邻里居民熟识，提高群众的社会性；可以使住宅区取得居住上最高的效果；可以使每一个居民得到正当而健康的娱乐游息；可以免除车辆的拥挤、交通窒塞的毛病，保障坐车人和行路人的安全[15]。

除了西郊新市区这一中心议题之外，梁思成在发言中还附带阐述了对于北平老城的分区问题及城门交通问题的意见，主张“现在市政府与中海的一部［分］为行政区”[16]。北平解放初期，北平市人民政府的驻地即在中南海，梁思成的建议是将中南海地区也规划为行政区。就行政区的层次或级别而言，梁思成对西郊新市区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应定为首都行政区”“联合政府所在地”。而对中南海的行政区，他并未进一步阐述，观点相对较为笼统。

仅就上述内容而言（这次座谈会上梁思成还有多次发言），梁思成关于北平西郊新市区建设的规划设想已经颇为全面。在发言中梁思成还谈到，“关于新市区问题：清华建筑系曾费多时讨论，我们研讨得一结论……”，这表明他的有关规划设想是一种相当确定的结论性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将北平西郊作为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正是日后梁思成和陈占祥于 1950 年 2 月联名提出《梁陈建议》的中心思想，正如该建议书在开篇以醒目的大字体所阐明的：“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17]（图 3）。

由上可见，梁思成关于首都行政区规划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即“梁陈方案”最核心的主旨要义，早在 1949 年 5 月初即已形成，且已经颇为全面、深入和系统。在这个意义上，“5.8 座谈会”堪称梁思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规划设想的最早呈现，是“梁陈方案”规划思想的原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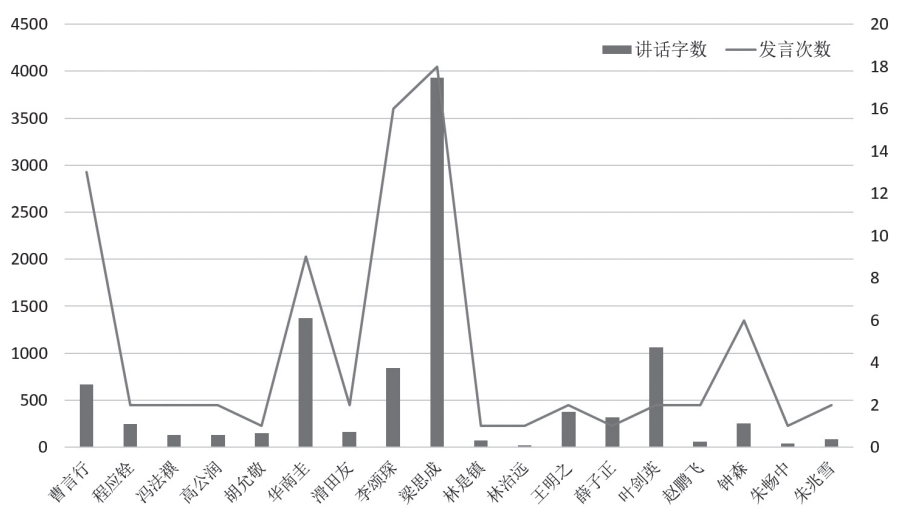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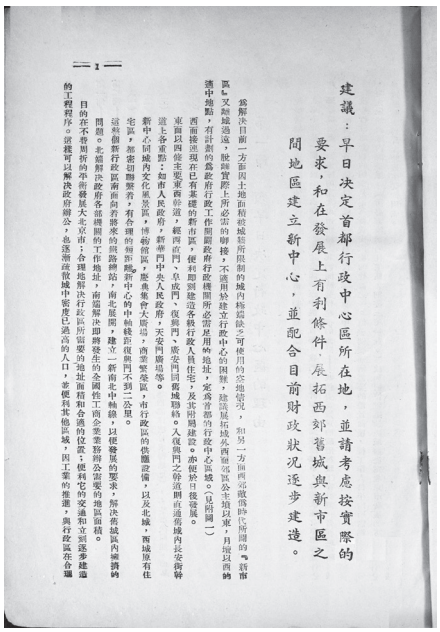


图 2：1949 年 5 月 8 日都市计划座谈会发言情况统计
注：左轴表示讲话字数，右轴表示发言次数。当时参会的部分人员未发言。



建議：早日決定首都行政中心區所在地，並請考慮按實際的要求，和在發展上有利條件，展拓西郊舊城與新市區之間地區建立新中心，並配合目前財政狀況逐步建造。

我解決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積被城垣所限制的城內格局拘束地使用，而另一方面西郊荒僻地區，又離城遠，脫離實際上所必需的聯接，並流用於建立行政中心的因難，以及城內人口密度過大，公共衛生知識不足，月增日西的情形，有計劃的爲政府行政工作開闢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需用的地址，實爲當務之急。

西面接近現在已有基礎的新市區，便利即刻建造各級行政機關，及其附屬建設。亦便於日後發展。

東面以西苑主要道路，經過直門、阜成門、復興門、廣安門到舊城內長安街等道上各重點；如南人民政府，新華門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門廣場等。

新中心同城內文化重點，博物館區，廣集會大廣場，南樂部廣場，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區，都要切聯繫着，南北中心的中軸線，以便發展的聚來，解決舊城區內擁擠的問題。北城有合理的街路格局，建立一新南北中軸線，以便發展的聚來，解決舊城區內擁擠的問題。北城新行政區南面向着將來的新公園，以便發揚公園要的地區面積。

目的在不當則拆的平衡發展大北京市；合理地解決行政區所需要的地址面積和合適的位置；便利它的交通並立到逐步建造的工程程序。當機會以解決政府辦公，急逐漸疏散城中密度已過高的人口，並便利其他區域，與工業的進步，與行政區在合理

图3：《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正文首页

三、梁思成规划构想的渊源：对日本侵略者所拟北京西郊新街市规划的批判与继承

梁思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建设的规划构想缘何被提出？其规划思想的渊源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5.8 座谈会”的档案记录之中。

梁思成在这次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言的开头部分就说：“关于新市区问题：……首先讨论性质。日本人是为移民而设，至日本投降粗具规模。我以为将来性质应为行政中心，联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则将毫无价值；因若单作商业，将无人去。以行政区为中心，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18]。紧接着，梁思成从交通和土地使用分配两个方面提出了“原计划的缺点”，前者包括街道没有把车流的性质分出来、交叉路口太多、道路面积太大和铁路分割市区等，后者主要是无显明的地域分区、住宅被店铺包围、各种公共建筑物缺乏且分配不当、空地面积太少、街坊面积太小和环形铁路妨碍将来发展等，正是在这些批判性内容的基础上，梁思成才提出了对西郊新市区规划的若干建议：“所以我们有一些建议：①先确定西郊新市区的用途。②原有计划差不多全无是处，应该全部详细计划。③应定为首都行政区……”[19]。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梁思成关于北平西郊新市区规划的构想，其实是基于对一个由日本人所主导的“原计划”进行批判而展开的，两者呈现出一种“破旧立新”的源脉关系。那么，梁思成又为何会对日本人的“原计划”进行批判呢？这其实是由北平市建设局为“5.8 座谈会”准备的议题材料之一“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引发的，该部分议题的内容如下：

二、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

新市区系指一九三九年间日伪时代建设之西郊新街市，位置在复兴门外，距城约四公里，第一期计划面积为一四·七〇平方公里，约合二二〇〇〇市亩。经日伪征收民地，经营数年，雏形粗具，已成建筑五百八十一幢，土路六七六五〇公尺，沥青混凝土路七一三〇公尺，沥青石渣路五一七〇公尺，水泥灌浆路二五〇公尺，碎石及卵石铺装路一〇六〇〇公尺，净水场三处，敷设水管二万余公尺，下水道污水管敷设一万四千公尺，并有医院、苗圃、公园、运动场等设备。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成立西郊新市区工程处，藉谋发展新市区业务。嗣经旧市政府将新市区内之业务分交各局执掌。土地业务归地政局接办，自来水二厂归自来水管理处（即现在的自来水公司）接办，房产地租归财政局接办，工务建设仍由工务局办理。惟土地因有发还与不发还原业主之争执，房屋因有伪北平行辕及伪华北总部统制分配，故土地及房屋问题，迄未得合理解决。

北平解放后，因事实上之需要，西郊新市区原有房屋，必须加以修理。新建房屋亦正在规划中。惟此种部分的建筑工程，应与全部建设计划配合，故新市区建设方针须从速规定。按北平城区已发展至相当成熟阶段，人口密度最大已至每公顷四六〇人，建筑面积最大已占房基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欲维持公共安宁，确保公共福利，将来发展应趋重于建设近郊市或卫星市。故建设西郊新市区实有必要，可利用已有建筑设施，疏散城区人口，新市区结构应包括五种功能：即（一）行政；（二）居住；（三）商业；（四）工业（轻工业或手工业）；（五）游憩，使成为能自主之近郊市。

关于新市区建设问题，计可分为左列[20]八项：1. 结构单位；2. 房屋建筑密度；3. 交通工具——与旧城区之联络（电车、公共汽车、火车问题）；4. 行政中心地点（自复兴大街北展）；5. 污水排泄及处理（向东南汇流入护城河）；6. 道路系统（完成数个中心后考虑改用放射式道路联系）；7. 建筑式样及高度；8. 建筑器材之大量生产。

在“5.8 座谈会”上，包括梁思成在内等各位专家的发言，都是围绕上述内容而展开的。其实，上述文字主要摘录自民国期间的一份规划文献，即由北平市工务局于 1947 年 8 月编印的《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5.8 座谈会”议题中的一些关键数据，如西郊新市区“已成建筑五百八十一幢，土路六七六五〇公尺”、“敷设水管二万余公尺”等，实际上是北平市工务局 1946 年春调查所得统计数据，并非 1949 年初的现状情况。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并于 1938 年底制订出《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该规划的重点是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和东郊建设两个新街市，其中又以西郊新街市为重点（图 4），目的主要在于“尽量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合居住以避免摩擦”，当时“人数激增的日本人，继续挤进中国人的居住区域，产生复杂之摩擦，状况不好到令人担忧的地步”[21]，因而《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实质上完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具有鲜明的侵略性质。

在“5.8 座谈会”的发言中，梁思成尖锐地批评日本人主导的北京西郊新街市规划“差不多全无是处，应该全部详细计划”。梁思成的这一发言，代表了中国专家对日本人都市计划成果其侵略实质的洞察及清醒认识，并包含着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绪。“5.8 座谈会”其他一些与会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率先发言的华南圭也明确指出：“我认为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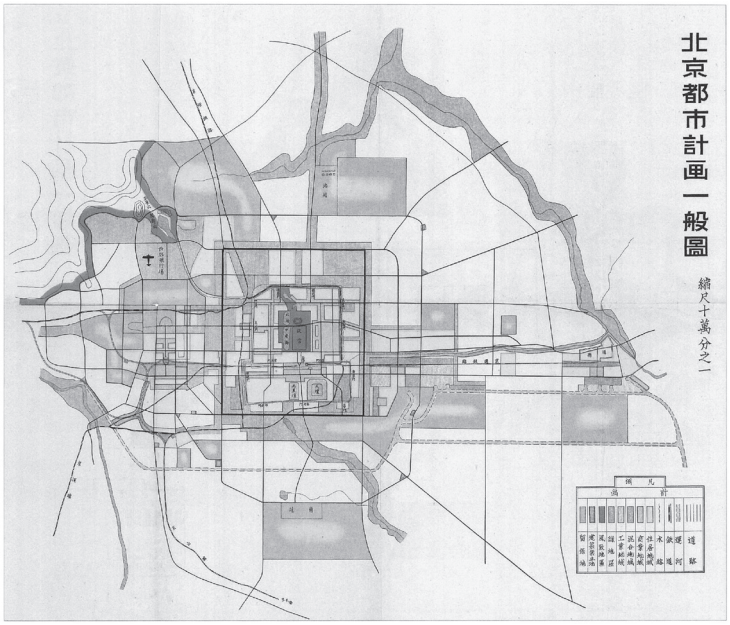


图4：北京都市计划（画）一般图（1939年）

计划太不完善，太守旧”[22]。

进一步分析，上文所谈及梁思成从“交通”和“土地使用分区”两个方面对日本人所拟北京西郊新街市规划的批判，其实主要限于规划技术层面，而并非一些较为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例如，梁思成批评“路的总面积占44%强。现欧美普通占33%，仍嫌多”，考察日本城市规划史可以了解，路网间距过小、交叉路口过多和道路面积比重过大等是其规划工作的一种普遍特点或习惯，尚谈不上实质性缺陷。就“土地使用分区”而言，梁思成在发言中所讲“土地使用分配不当，无显明的地域分区”针对的主要是西郊新市区的范围，这样一种地域划分的主张与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功能分区概念并不相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详细规划层面的用地布局安排或片区规划设计，而这类详细规划设计则存在着多方案选择的灵活性。

与交通和土地使用分区相比，一个相当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是西郊首都行政区的具体位置。从梁思成的发言来看，他对之前由日本人选择的西郊新街市的建设地点并无异议。主张避开原有日本人据点，将西郊新市区的位置从公主坟以西移到公主坟以东最早的倡议者，是此后于1949年10月底来到北平与梁思成合作的陈占祥[23]。

四、从“5.8座谈会”到1950年2月《梁陈建议》：梁思成规划思想的发展和演化脉络

关于“5.8座谈会”，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另一项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众所周知，1950年2月提出的“梁陈方案”具有鲜明的保护北京老城历史文化的思想，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建议书中明确指出：“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改变成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大众人民能见及这点的很普遍。”[24]

反观“5.8座谈会”发言，关于在北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梁思成的着眼点主要不是古城保护而是新市区发展的前途。他说：“将来（新市区的）性质应为行政中心，联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则将毫无价值；因若单作商业，将无人去。以行政区为中心，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这一思路，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几度广为流行的以行政机构搬迁（或建设）来带动新区发展的一种城市开发模式。换言之，依据原始谈话记录内容分析，在“5.8座谈会”上，梁思成的规划动机，既非保护北京老城，也非解决首都行政机关办公这一日后才愈加凸显的难题。

在临近1949年5月8日的时刻，支撑梁思成形成在北平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这一规划构想的大致有四个因素：1. 当时的西郊新市区已经经历10余年规划建设经营所形成的令人瞩目的基础条件；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经考虑将其作为首都建设备选地的历史因缘[25]；3.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1949年3月底起在北平西郊驻地并修建“新六所”等办公用房的明确信号；4. 西郊地区的用地和房屋多为从国民党政府接管的“逆产”而便利于拆迁或利用。出于这些条件或考量，在西郊规划建设首都行政区，自然是顺理成章。这个规划思路在“5.8座谈会”上提出后，实际上也得到了与会领导的明确回应。北平市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指出：“梁先生提出新市区的用途，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共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内”；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强调：“今天集中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子正则呼吁：“各位把新北平计划一下，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建设东郊西郊新北平……近一两年来西郊新北平荒废，希望提前一步建设起来……”[26]

由此可见，尽管在1949年的“5.8座谈会”上和1950年2月的《梁陈建议》中，梁思成都在坚持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专门的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和方案，但是，在两个时间节点上，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规划设想所承载的思想、意图和规划目的截然不同：前者着眼于新市区发展的前途，后者强调对于古城的保护。我们因此可以观察到梁思成规划思想背后一个发展和演化的脉络。对这个演化脉络进一步考察，则需要对梁思成的规划工作背景和过程有所了解。

“5.8 座谈会”上，钟森等有关专家提议成立首都规划机构——“都市计划委员会”。此议得到普遍赞同。会后经过筹备，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平都委会”）于 1949 年 5 月 22 日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的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27]。这一决议在次日的《人民日报》公布[28]。随后，梁思成团队正式启动北平西郊新市区规划工作，并陆续完成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1949 年 9 月 1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委员大会，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会上“梁思成教授报告西郊新市区计划称：两个多月来，已完成的计划有：（一）大北平道路系统，（二）新市区道路计划，（三）天安门广场，（四）东单广场，（五）西直门道路系统，（六）新市区邻里单位设计，（七）西郊大礼堂，（八）西郊将来行政中枢设计，（九）西郊区行政中心计画，（十）西郊广场，（十一）西郊托儿所，（十二）邻里单位中卫生站设计等十余幅，并把这些草图悬挂在会场上，供大家参考和提出意见”[29]（图 5）。

然而，这次阶段性汇报和讨论之后，梁思成主持的西郊新市区规划工作却出现了重大的变数。1949 年 6 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始之后，中央领导需频繁往返于驻地所在的香山和会场所在的城区，交通、通信、供应和安全各方面均感不便。后主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在周恩来等的反复劝说下，经党中央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和决策，毛泽东主席于 1949 年 9 月 9 日搬进了中南海[30]。随着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入驻中南海，之前关于在北平西郊建设中央行政机关的设想，包括“新六所”建设等在内，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自 1949 年 9 月份起，在中央和北京市的各类文件及

都首民人設建
中畫計在區市新郊西平
大開會委畫計市都市平
會，梁思成等成提出報告。

图 5：香港《大公报》1949 年 9 月 15 日刊发的关于北平西郊新市区计划进展的消息
注：李百浩教授提供。

有关领导的讲话中，几乎再未出现过在西郊地区建设中共中央机关的提议或工作部署。

另一方面，随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工作推进，在宋庆龄于 8 月 28 日到达北平以及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等于 8 月底在南苑观看飞机表演后，在 9 月 20 日召开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才最终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日期定在了 10 月 1 日，当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 10 天时间[31]。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各类首都行政机关的设置、人员组织及办公场所的必要安排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当时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各个首都行政机关的布局主要采取了在北京城区内利用现有房屋和设施的应急方式。

这一变化使得之前关于在北平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这一较为从容的规划设想遭到釜底抽薪，失去其必要性。梁思成为此焦虑不安，并在 1949 年 9 月 19 日致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的信中表露无遗[32]。毋庸置疑，为数庞大的首都行政机关在北平城区见缝插针、安营扎寨，并按需改建扩张，是 1949 年 9 月前后北平古城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对北平古城及建筑风貌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从他的角度出发，当然不希望由于各类行政机关的驻扎而对北平古城的风貌产生破坏。而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在城市规划方面所可能采取的一项应对措施，正是在西郊规划建设一个专门的首都行政区，亦即梁思成在“5.8 座谈会”上曾经提出的设想。这一点，正是梁思成在 1949 年 9 月首都规划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依然坚持和固守先前设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由此也反映出 1949 年 9 月以后梁思成继续呼吁在北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前后首都各类行政机关已经在北京老城内安顿，它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现状条件。1949 年 9 月 16 日苏联市政专家团抵达北平，11 月 14 日举行专家 М・Г・巴兰尼克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的专题报告会。会上曾展示一张“中央各部委分布现状图”（图 6），反映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首都机关在北京老城布局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时隔 3 个月之后，1950 年 2 月提出的《梁陈建议》仍坚持在北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显然是要用科学理性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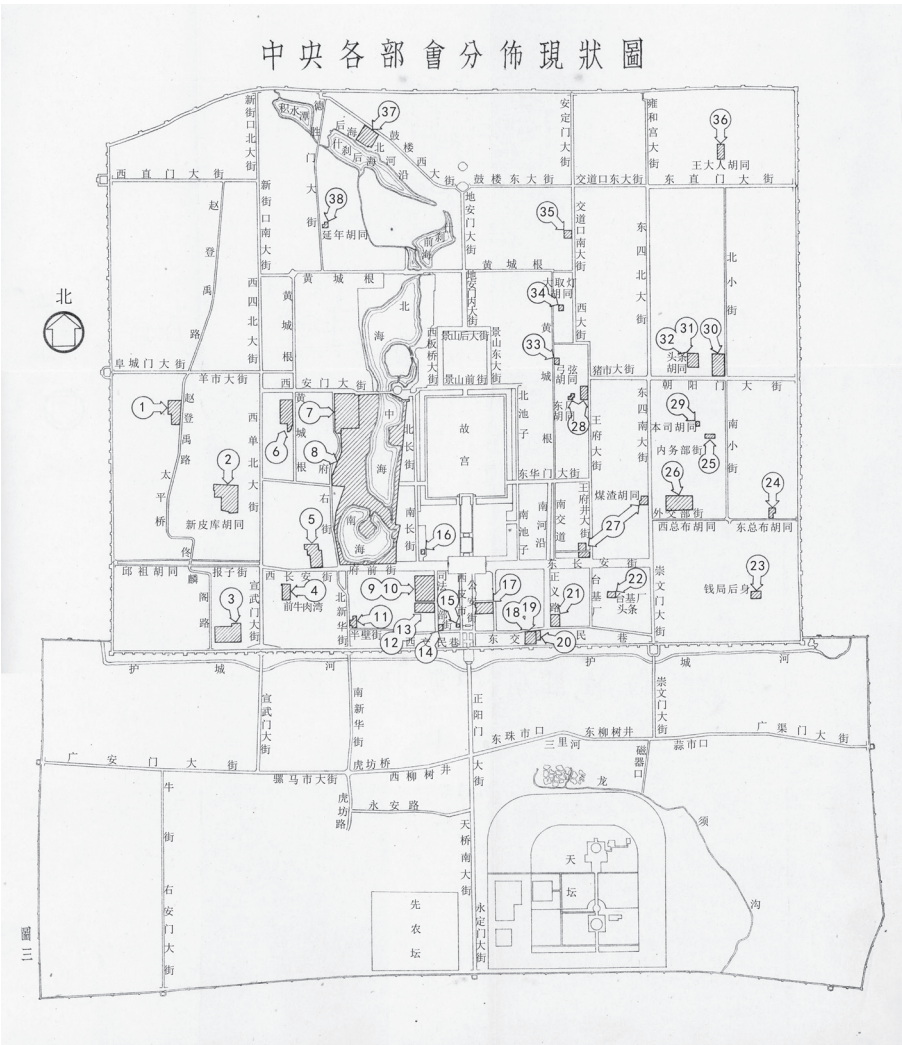


图6：中央各部委分布现状图(1949年11月)
注：原图图幅较大(字体相对较小)，为便于阅读，特将图中主要文字重新录入。
图中编号：1. 政治法律委员会，2. 教育部，3. 新闻总部，4. 人民监察委员会，5. 邮电部，6. 内务部，7. 政务院，8.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 最高人民法院，10. 最高人民检察署，11. 轻工业部，12. 司法部，13. 法制委员会，14. 人民银行，15. 公交部，16. 水利部，17. 财政部，18. 燃料工业部，19. 重工业部，20. 纺织工业部，21. 贸易部，22. 海关总部，23. 农业部，24. 出版总署，25. 食品工业部，26. 外交部，27. 铁道部，28. 科学院，29. 林垦部，30. 财政经济委员会，31. 文化教育委员会，32. 文化部，33. 情报总署，34. 民族事务委员会，35. 交通部，36. 华侨事务委员会，37. 卫生部，38. 劳动部。

规划来改变这种城市发展现状。

反观《梁陈建议》，其中反复强调科学规划的思想观念："简单地说，今日所谓计划，就是客观而科学的，慎（缜）密地而不是急躁地，在北京地面上安排这许多区域。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别的关系也合理，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在一个现代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与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计划时必须预先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得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至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33]。在城市规划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设想以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去改变城市发展现状，其难度可以想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为了说服有关领导，《梁陈建议》将其规划思想及分析论证的焦点特别转向了对北京老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首都行政机关房屋安排的考虑，前者有助于占领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后者则显示出对于现实的关怀。

五、总结和讨论：对"梁陈方案"事件的启示

综上所述，"5.8座谈会"是"梁陈方案"规划思想的重要原点。梁思成关于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即"梁陈方案"最核心的要义，早在"5.8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已经有相当明确而系统的阐述。1949年5月8日这个时间，既早于首批苏联专家团到达北平（1949年9月16日），更早于陈占祥首次来到北京并第一次与梁思成和林徽因见面（1949年10月底）。所以可以说"梁陈方案"最核心的建议内容与苏联专家无关。

然而在1949年9月时，中共中央机关从西郊迁入北京老城区这一决定使得原有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面临流产危险，而开国大典前之后大批中央行政机关急于寻找办公地址而在城区四处占地，又使北平古都风貌和优美秩序面临破坏威胁，这些情况都使对北平城和古建筑无限热爱的梁思成感到无比焦虑。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和这样一种心境之下，梁思成与陈占祥一道，在1949年11月14日召开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报告会上，针对首都行政机关位置问题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后来又进一步正式提出了书面的《梁陈建议》。

考察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可以发现，面对当时社会形势的纷繁变化，梁思成关于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学术主张并没有因之而产生动摇。他和陈占祥的确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但这样的不同见解却又并非产生自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而只是在坚持梁思成本人早已有之的学术主张。可以讲，梁、陈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更准确地说并不在学术方面——梁、陈只是将他们当时对社会各方面的一些意见和担忧，通过一种看似学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进行这样一个表达所依托的媒介，即苏联专家。换言之，对于"梁陈方案"这一事件而言，苏联专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扮演了有关技术责任的承担者的角色。

1949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团的使命是对

市政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但出于使新中国首都能够有更长远发展的考虑，基于莫斯科规划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对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也是出于善意。从首都规划史的角度看，苏联专家的建议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舆论乃至学术语境中，却把苏联专家放到了中国专家的对立面，甚至采用"遭遇强劲对手""与苏联专家的较量"[34]等充满敌意乃至蔑视态度的煽情语言，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

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对于"梁陈方案"这一事件而言，1949 年来华的苏联专家为什么会扮演了有关技术责任的承担者的角色？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在苏联市政专家团抵京之前，梁思成团队已经获明确授权而承担"新北京计划"这一委托规划任务，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而苏联专家在技术援助过程中，逐渐对北京城市规划问题也提出一些建议，这一具有"规划咨询"性质的技术援助工作，与梁思成团队的规划委托任务形成一种相当微妙的竞争关系，梁思成团队对此能否心平气和地接受呢？

其次，需要注意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尽管中苏两国在 1950 年代曾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蜜月期"，但在 1949 年这个特殊年份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更直接地说，当时的中国民众，对于苏联专家并非完全信任。据中共北京市委 1949 年 12 月 3 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在两个多月工作中，干部与苏联专家间关系很好，绝大多数都是以老实虚心的态度，告给他们各种情况，并共同商定了工作计划"，"只有一小部分旧技术专家和他们不很融洽"，"有些技术人员在思想上存在着敌对态度，企图以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国情来对付专家的建议"[35]。报告中指出："开始时，我们为了把关系搞好，曾于九月十九日召集干部会，由彭真同志反复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关系，强调说明一切干部与苏联专家要采取老实的学习的合作的态度"[36]。之所以如此，也正反映出当时中方部分人员对苏联专家有所抵触的实际思想状况。

再者，1949 年苏联专家团对北京城市规划问题发表意见，是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向中国的首次输入，当时中国多数的知识分子，包括建筑和规划界的专家学者乃至政府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于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情况难免缺乏了解。在未能开展较充分的沟通、交流和研讨之前，对于苏联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做法，也必然难以理解、难以认同。比如，在 1949 年 11 月 14 日的报告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曾按照基本人口、服务人口和被抚养人口分类——即"劳动平衡法"——来分析和预测北京未来人口发展，这一技术性色彩颇重的规划分析方法，依苏联专家来讲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但对于当时参会的中国同志而言，恐怕只能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正是由于苏联规划理论的首次引入，也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大胆质疑及自由讨论的可能。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于 1950 年 2 月合著一篇针对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建议的评论，其中谈道："现时我们的参考书大部是英美出版的，但关于近三十年来的都市计划的趋向及技术是包括世界所有国家的资料的——苏联的建设情形也在内"，"有许多苏联的计划原则也是欧美所提倡，却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不能够彻底实现，所以他们只能部分地，小规模地尝试"，"现时中国优秀的建筑师们大多是由英文的书籍里得到世界各种现代建筑技术的智慧。他们都了解自己新民主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主场，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很深的认识。他们在建设时采用的技术方面都是以批判的态度估价他们所曾学过外国的一切"[37]。这是一种相当微妙的立场和态度。更直接地说，梁思成等对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学习苏联规划理论表示赞同，但是，却并非"唯苏联规划理论'马首是瞻'"。

就梁思成和陈占祥等而言，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作为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国际知名的建筑和规划专家，面对初来乍到的苏联专家，提出不同意见，直抒个人见解，实不应当被视为思想对立的行为。恰恰相反，他们的直言体现了中国建筑家和规划师的专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担当。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梁思成和陈占祥于 1950 年 2 月提出的《梁陈建议》和他们所主张的"梁陈方案"，其实并非一份单纯的技术性文件，而是蕴含有相当复杂的多重意蕴：除了保护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这一由《梁陈建议》文本所直接传导的思想观念之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及苏联专家建议的质疑，作为《梁陈建议》附件之一提交给毛泽东主席的评论文章《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更是这一质疑的直接表现。进一步解读，《梁陈建议》所承载的对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及苏联专家建议的质疑，背后的真正意图则是对当时首都各类行政机关在老城见缝插针安营扎寨以及政府方面无力扭转这一局面的无奈。正因如此，"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以规划专业技术的方式所表达的自身对于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思路与主张。除此之外，由于 1949 年 5 月 22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曾正式授权梁思成团队开展西郊新市区规划，按照制度，梁思成也应对此工作的结果有所交代。1950 年 2 月提出的《梁陈建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此乃"梁陈方案"的另外一层意蕴。

（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赖德霖先生大力指导并详细校改，谨致特别感谢！）

附件：1949 年 5 月 8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梁思成首次发言内容（会议记录）

梁 [思成]：刚才听华老先生讲，很佩服，有几点很同意，大兴土木可以刺激生产，这点很同意，但有几点值得讨论。

①交通问题：应如何减至最少，是人力、物力的节省，千万不要弄到伦敦那样，

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汽车运输工人，这个人来运输其余六个人以及这六个人的生产消费物资，所以交通可以繁荣工业，但不可浪费，大兴土木也是一样，不宜浪费，所以应该先有计划。

②关于北平城墙：我以为需要保留它（固然在文物观点是应保留的）现在内城高3丈，原2.5丈，除五、六尺城砖外，内为灰土。明成化嘉靖建城至今五六百年，积压结果，恐非炸药不可，拆下来的几万吨废物，处置也成问题，而且拆下来的城砖，未必比新砖便宜。我以为城上可以改作公园栽花池等，城楼可作展览，民众教育馆，茶馆等。城下可作绿地改善附近居民环境。

③关于新市区问题：清华建筑系曾费多时讨论，我们研讨得一结论：

I. 首先讨论性质。日本人是为移民而设，至日本投降粗具规模。我以为将来性质应为行政中心，联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则将毫无价值；因若单作商业，将无人去。以行政区为中心，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

II. 原计划的缺点：

A. 交通：

a. 街道系统极不适合现代之用。因为街道不分商业或是住宅区，没有把车流的性质分出来——因一二十年至晚五十年后，人力车将为工厂吸收去，代之者为汽车。

b. 交叉路口太多。每一百余米一个路口，是1800年美国式办法。每一百余米一红绿灯，汽车行车不便。

c. 路的总面积占44%。现欧美普通占33%，仍嫌多。无端将道路面积加大，浪费土地，增加铺路费，上下水电等都浪费，增加居民负担。

d. 铁路通过市区，把市区划为两半，有碍市区的完整性。铁路两旁既不适于居住，也不适于商业。

B. 土地使用分配不当，无显明的地域分区：

a. 按照日本人计划，凡面临马路之处一律为店铺，住宅被包围在内。

b. 各种公共建筑物既缺乏，分配又不得当。如公会堂，图书馆等都偏在最北边。

c. 空地面积太少。刚才华老先生讲理想9/10，他赞成建筑面积占1/5，但近来建筑面积多选定1/10。应分布在市区里边，不能在市区外，因在市区边缘等于没有。

d. 每坊（Block）的面积太小，因而增加一切公用设备分担，应向一九三三年柏林西门子公司的Zeilenban[板式住宅楼]学习，把五六个坊合为一个坊。

e. 四面都有铁路环绕妨碍将来发展。

所以我们有一些建议：

①先确定西郊新市区的用途。

②原有计划差不多全无是处，应该全部详细计划。

③应定为首都行政区。应先将行政区划出，住宅区围绕行政区（定所有居民为行政公务员）。分区的原则应该分为邻里单位（或叫它一区一保也可以），每一个邻里单位自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集团。每一个邻里单位应该以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数个托儿所为中心，使儿童可以自己上学回家不经过主要街道，邻里单位之内，并应有邮局及供给本单位的菜市场和日用品商店。在本区内应有几处集中的商业区，可以供给几个邻里单位之用的本区居民。若需要特别购买时，可往商业区购买。普通日常生活所需可在自己的邻里单位内购买。

④本区除维持本区内水电交通所需的修理工业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工厂设立。

⑤每个邻里单位应有充分的小公园，及儿童游戏场，供本单位成人和儿童游憩之用。再用林荫道把这些小公园连接起来，一直通到外围的麓作区或林园地带，成为公园网。

⑥每一邻里单位，应有林荫大道隔离。这种林荫大道，只供区内交通之用，不是作市际交通用。

⑦因此，我们要将整个区四周用麓田或公园包围。在此区内，除了麓家及市立的公园游憩的建筑物外，不得造任何房屋。东北面西面还应建立100公尺宽的树林，以掩蔽西北来的风沙，并隔离平门铁路的音响及煤烟。

⑧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道路系统。第一，凡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路，如上西山八大处，石景山门头沟的公路或是往来丰台、良乡的公路，均不应穿过本区。但应在南北两面各设一大道，以取得交通上之便利，而避免穿过本市的嘈杂、尘土臭味等。第二，区内的交通网应以行政区为中心，在相当距离建造几条平行的环形道路，以避免由区的一极端到另一极端的车辆穿过市中心。这几条环形马路之间，应该有中心放射出来的次要干路，与环形路连画在环形路与次要干路之间的地区，只设立地方性小道，摒除一切高速度通过性的车流。

此外，在交通适当场所，应设立中学、图书馆等。当视整个计划而定。

总结：①这种以邻里单位为基础的分划，可以使邻里居民熟识，养成合作互助的精神，提高群众的社会性，这是城市生活中一个极重要因素。②这种将住宅区与商业区明显的分划，可以使住宅区安静清洁，取得居住上最高的效果。③这种公园网可以使每一个居民在工作之余，得到正当而健康的娱乐游息。④这种街道网可以使性质不同的车流各有可循环的轨道，可以免除车辆的拥挤、交通窒塞的毛病，可以减少车祸，保障坐车人和行路人的安全。

一切的计划，我们得有统计的数目和对于将来发展的推测，然后才能开始计划。这一部分工作，不单是我们作体形计划的人的工作，需要各方面供给我们资料，让我们计划有所依据。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市区，原来没有任何基础，所以对于将来的计划，不必依赖现状调查，而纯粹由推测的预计而设计的（至少推测五十年后的发展情形）。所以，尽一方面来说，问题很简单，而另一方面说起来，凭空推测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听曹局长说建设局有研究室，可由研究室作资料工作。

附带说北平分区问题：

①现在北平无商业区。勉强说集中在六处：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前门、后门，形式为带形，沿大道发展。缺点是既为商业区，又是干道，优点在于能供应胡同出来的居民。

②现在市政府与中海的一部[分]为行政区。

③外城南部天坛之东及东北，先农坛之西及西北，为轻工业区，并用邻里单位为原则，建立工人住宅区。

④北平以东至通州一带，为工业区（北平不具备重工业条件），并应疏浚自二闸至天津间之运河。

分析北平的交通，现在都在两个环上流，一个是东西长安街东单东四，另一环是东西长安街、府右街南北池子等。

再说城门交通问题：

①城门左右各开一洞，瓮城左右各开一门，原有门洞不用，左右洞各为单行道。

②城门附近要拆除少数房屋，加宽马路，在距城门相当距离以外，路中用草地隔离，以分来回。

③铁路最好降至地面下，或降下一米，把公路自远处提高坡度。（因为北平地下水面高，可能不适于地下铁）

附带更主张顺城街应开为马路，城墙改为公园。此外感到北平绿地公园虽不少，但太不平均，此后空地当多设公园，每邻里单位当设公园。此后如遇大旧房等拆除，宜建绿地，对市民健康生活影响极大，并影响生产工作效率。

注释

[1]窦忠如. 梁思成传[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202-207.

[2]左川. 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8（3）：34-53.

[3]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6.

[4]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征集编辑办公室编. 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 "第一卷：规划建设大事纪"（上册）[R]. 1998：3-4.

[5]张汝良. 市建设局时期的都委会[R]. //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史征集办公室编. 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 1995：134.

[6]同[5].

[7]在万寿路附近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另外一栋服务楼。

[8]中直修建办事处. 为中直机关修建三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回忆录（1949～1952年）[R]. 1990：3.

[9]同[8].

[10]北平市建设局. 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讨论题目[Z].// 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记录.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03，1949：8-12.

[11]北平市建设局. 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记录[Z].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03，1949：13-28.

[12]—[16]同[11].

[17]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R]. 国家图书馆收藏，1950：1.

[18]—[19]同[11].

[20]原稿为竖排体。

[21]越泽明著. 北京的都市计画[J]. 黄世孟译. 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1987（1）：235～245.

[22]同[11].

[23]陈占祥. 忆梁思成教授[M].//《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51-56.

[24]同[17]，P7-20.

[25]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国民政府在定都问题上引发了一场由政界及学界有关人士广泛参与的激烈的大讨论。在这场定都问题的讨论中，北平也是建都的重要备选方案之一。1945年12月，在《中央日报》和《申报》等主流媒体上报道北平市市长熊斌"非正式晤记者，北平有十分之七希望成为中国未来国都"，其重要现实依据即"敌前在[北]平西郊兴筑之'新北京'业完成五分之一，当局决定筹款续建以完成大北平计划"。参见：佚名. 故都转向新生，有希望成为未来国都，决续建西郊"新北京"[N].(南京)中央日报,1945-12-24(2).

[26]同[11].

[27]北平市都委会. 北平市都委会筹备会成立大会记录及组织规程[Z].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01，1949：13-20.

[28]超祺. 建设人民的新北平！——[北]平人民政府邀集专家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N]. 人民日报，1949-05-23（2）.

[29]佚名. 建设人民首都——[北]平西郊新市区在计画中大公报（香港）[N]. 大公报（香港），1949-09-15（7）.

[30]顾保孜.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4-8.

[31]刘明钢. 开国大典的日期是何时确定的？[J]. 党史博采（纪实），2009（7）：8-9.

[32]梁思成. 梁思成致聂荣臻信[M].// 梁思成、陈占祥等. 梁陈方案与北京.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63-69.

[33]同[17]，P12-15.

[34]王军. 城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2、97.

[35]中共北京市委. 市委关于苏联专家来京工作的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2月3日）[R]. //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 1955：198-203.

[36]同[35].

[37]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 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Z]. 中央档案馆，案卷号：Z1-001-000286-000001，1950.

图表来源

图1：北平市建设局. 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讨论题目[Z].// 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记录.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03，1949：8.

图2：作者自绘。

图3：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R]. 国家图书馆收藏，1950：1.

图4：[日]越泽明著. 1895-1945年长春城市规划史图集[M]. 欧硕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7：176.

图5：佚名. 建设人民首都——[北]平西郊新市区在计画中[N]. 大公报（香港），1949-09-15（7）.

图6：巴兰尼克夫. 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单行本）"图三"[Z]. 北京市建设局编印，李浩收藏. 1949.